

论美国的反倾销措施对美国出口商的影响

Robert M. Feinberg和Kara M. Reynolds 著，马林梅、吴春雷* 译

原载：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8, Vol. 144 (2)

一、引言

当欧盟与美国持续成为反倾销的主要发起国时，这种针对进口的“行政性”保护措施已经非常普及，1995—2003 年间，共有 39 个国家发起过反倾销。就美国而言，1995—2003 年间，外国的相关机构针对美国企业发起的反倾销为 138 起，而同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针对国外企业发起的反倾销为 302 起。

1995—2003 年间，美国是位列中国与韩国之后的第三大反倾销被诉国，占除美国之外的其他 WTO 成员国所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总数的 6.5%。该期间内，针对美国的反倾销案件呈大致平稳分布态势，每年在 12 到 21 起之间，而同期美国对国外出口商发起的反倾销呈稳步上升态势，从 1995 年的 14 起增长为 2001 年的 63 起，而 2002、2003 年的数量有所下降（分别为 32、36 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针对美国的反倾销并没有增加。事实上，1986—1994 年间针对美国的反倾销为 163 起，而随后的九年里，该数字下降为 138 起，如图 1 所示。然而，自 1986 年以来，针对美国的反倾销的发起国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从 1986 年至 1994 年针对美国的反倾销的发起国主要为加拿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而随后的期间里，主要的发起国为墨西哥（17%）、印度（14%）、巴西（13%）、加拿大（9%）、中国（8%）和阿根廷（7%）。1995—2003 年间美国对外反倾销的主要对象国家和地区为中国（17%）、日本和欧盟（均为 10%）、韩国（7%）、以及印度和台湾地区（均为 5%）。这些案件所涉及的行业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美国对外反倾销的案件有 59% 涉及到金属制品（HS 第十五大类），而针对美国的反倾销案件有 62% 涉及到 HS 第六、七大类商品（即化学及塑料制品）。

人们已经注意到反倾销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曾就美国是否遭新发起国的反倾销报复以及美国的出口商是否因此而遭受损失进行了调查（1998），发现：未来，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的持续增长对美国出口商的影响不是很大。类似地，Lindsay 和 Ikenson（2001）关注了新发起国的反倾销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日益增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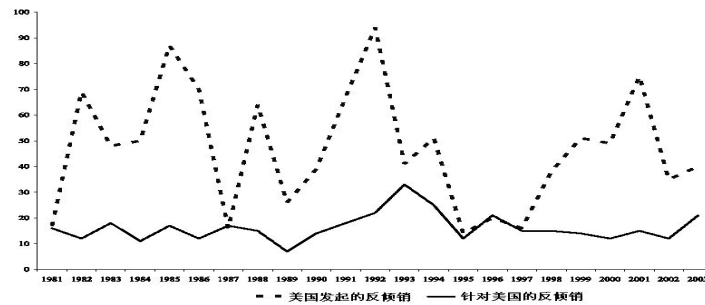
近年来，对于针对美国的反倾销提出的一种新的解释是：这些反倾销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特别是对美国大量使用反倾销保护的报复。Prusa（2001）简单地论述了政府采用反倾销政策——旨在威慑其他国家的反倾销的策略问题，但是这种威慑可能会由于引发的报复行为而导致的囚徒困境而最终失败。Prusa 和 Skeath（2002）对上述观点做了更

* 译者已经得到了原文作者的同意，取得了中文翻译授权

为深入的阐述，发现反倾销起诉的背后存在着战略动机。

Blonigen and Bown (2003)运用针对一国的反倾销行为来限制该国自己的反倾销行

图一：美国发起的和针对美国的反倾销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8）和 Zanardi（2004）的数据整理获得

的机动价格模型研究后发现：美国的状况与预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Francois 和 Niels(2004)认为反倾销的新使用者发起反倾销是为了报复对其出口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家。他们的研究发现，墨西哥对那些在前一年对其发起反倾销的国家提出反倾销起诉成功的概率是对那些没有对其进行过反倾销国家的概率的三倍。在此情形下，我们所称为报复的含义要比战略行为的运用宽泛。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如果政府按照企业的意愿行事，则企业从发起反倾销行为中所获得的预期利益要更高。

Prusa 和 Skeath (2004)发现：反倾销的发起国更易将有反倾销法的国家和历史上曾将其作为被诉国的国家作为其反倾销的指控对象国。他们将其解释为报复或以牙还牙，尽管这些措施并不具备理论的博弈模型所要求的为了使用报复手段而建立的可行的威胁或有效的以牙还牙机制。

Feinberg 和 Reynolds (2006)运用概率分析法，对1995—2003年间WTO成员国所提交的反倾销起诉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检验了一国的反倾销是否是对出口国相似措施的报复。研究发现：过去的十年当中，报复是反倾销增加的一个显著原因。本文旨在分析针对美国的反倾销是否是类似的情形以及美国反倾销体制对美国的出口商的危害程度。

二、数据及模型假设

我们使用1995—2003年间WTO成员国提交的针对美国特定产业的反倾销起诉数据。本文中，“产业分类”的依据是HS的20大类，将数据样本限定在14类，以保证样本区间内每一产业都有至少一起针对美国的反倾销案件。为避免样本选取的偏差，所选取数据包括39个在样本区间内较多使用反倾销的WTO成员国提交的反倾销数据，尽管仅有19个国家在此期间对美国提出了反倾销起诉。为考查反倾销起诉所引起的报复行为的一年的时滞，将样本期间的选定为1996—2003年。最终的数据观测值为4312个。特定国家/产业/年的反倾销起诉的总数在0到3之间，而2.4%的观测值中至少有一起反倾销案件。

为研究针对美国的反倾销指控的决定因素，运用总体平均概率模型，该模型中，因变量

为 y_{ijt} , 表示 i 国在 t 年对美国的 J 产业至少提起一起反倾销指控, 特别地, 假设 i 国在 t 年对美国的 J 产业提起一起反倾销指控的概率由如下公式确定:

$$\Pr(y_{ijt} = 1 | x_{ijt} + e_{ij}) = \Phi(x_{ijt}\beta + e_{ij}) \quad (1)$$

x_{ijt} 表示发起反倾销起诉的各种决定因素, e_{ij} 表示未考虑到的反倾销起诉的各种因素, β 为待估计的参数, Φ 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

不同于随机概率模型那样估计 e_{ij} 所包含的未观测到的效应, 该总体平均概率模型仅用来描述边际分布。运用总体平均概率模型可以直观地用如下函数估计条件参数:

$$\Pr(y_{ijt} = 1 | x_{ijt}) = g(x_{ijt}\beta) \quad (2)$$

g 为通过调整待估计参数的协方差矩阵表示特定国家-产业的跨年相关性的分布函数。这种方法的边际效应可以解释为整体样本中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对特定国家将要美国的特定产业进行反倾销起诉的可能性的平均影响。或者, 边际影响可以解释为自变量的变化引起的发起反倾销起诉的观测值比例的变化。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查针对美国出口商的反倾销行为是否可以解释为是对美国早先的反倾销调查的报复, 特别是假设外国产业可以选择对美国出口商提起一起或者更多的反倾销指控来进行直接报复。然而, 正如 Feinberg 和 Reynolds (2006) 所指出的那样, 报复也可以发生在国家的层面上。例如, 倘若美国在前一年对一国发起过反倾销, 则该国的反倾销实施机构更倾向于对美国的企业做出肯定性的裁决并且征收更高的反倾销税。假如这样的话, 企业预期能从针对美国的反倾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企业也越倾向于对美国发起反倾销指控。

为控制特定产业的报复, 设置一个虚拟变量 (CAT) 来表示过去美国是否对进口国家及产业发起过反倾销。为控制国家层面的报复, 设置虚拟变量 (OTHER) 表示过去美国是否对进口国的其他产业发起过反倾销。由于宽泛的产业分类可能导致 CAT 和 OTHER 两个变量都表示国家层面的报复, 所以在其它地方用单一变量 (RETALIATION) 来表示过去美国是否对进口国发起过至少一次反倾销。

假设如果美国为另一国的重要出口市场时, 则该国对美国发起反倾销时更易受到威慑, 特别是当美国已经通过其多次的反倾销措施证明美国有能力对进口国进行报复时更是如此。作为对美国自己的反倾销措施的威胁的衡量, 设置变量 (DETER) 来表示进口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份额乘以美国上一年的反倾销总数。如果对美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确实由于美国历史上的反倾销措施而受到震慑, 则该变量值为负。

是否对美国的特定产业发起反倾销, 这明显取决于该国、该产业从美国的进口水平。在此设置变量 (IMPORT) 表示广义 HS 产业分类基础上的双边年实际进口额。另外, 如 Bown 和 Crowley (2007) 所述, 对一国的反倾销可能导致其出口转变到其他国家, 而这又会导致第三国更多的贸易保护, 包括对美国的反倾销起诉。因此设置变量 (DEFLECT) 表示上一年除已经考虑过的针对进口商的反倾销案件以外的特定行业的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

本文也考查了其他学者所关注的宏观经济因素在其他国家针对美国的反倾销行为中的作用。如, Knetter 和 Prusa (2003) 以及 Feinberg (2005) 发现: 货币升值或者 GDP 下降的

国家更易对外发起反倾销，至少反倾销的四大传统发起国——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和加拿大是如此。直观地说，这两种因素都使得政府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更易得出本国的产业受到指控国进口的损害的结论，从而做出肯定性的裁决。考虑到这些宏观经济因素，设置了滞后的双边实际汇率（EXCHANGE）和实际GDP增长（GDP- GROWTH）两个变量。实际GDP增长变量为三年的增长率或者是反倾销起诉日前三年的增长率。最后，设置年度固定效应变量来控制可能导致针对美国出口商的反倾销增加的美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因素。统计结果见表1。

三、实证结果

总体平均概率模型的边际效应如表2所示。(1)列数据试图解释特定产业(CAT)以及国

表1. 统计总结表

	中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FILE	0.024	0.154	0.000	1.000
CAT	0.033	0.178	0.000	1.000
OTHER	0.287	0.452	0.000	1.000
RETALIATION	0.301	0.459	0.000	1.000
DETER	24.684	20.491	0.646	89.096
DEFLECT	17.727	24.517	0.000	122.000
IMPORTS (billions)	2.181	4.938	0.003	23.782
GDPGROWTH	-0.091	0.074	-0.277	0.168
EXCHANGE	0.018	0.186	-0.961	0.514

家层面（OTHER）的报复效应。边际效应显示单个产业不会选择报复，报复发生在国家层面上。特别地，那些在上一年被美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对美国发起反倾销指控的概率平均要高1.7%。这就表示对美国发起反倾销的预期概率为100%。

表2. 对美国发起反倾销起诉的决定因素（总体平均概率模型的边际效应估计）

	(1)	(2)	(3)
CAT	0.00769 (0.01108)	—	—
OTHER	0.01692. (0.00618)	—	—
RETALIATION	—	0.01548. (0.00594)	0.00802 (0.00580)
RETALIATION×METALS	—	—	-0.00164 (0.01214)
RETALIATION×CHEMICALS	—	—	0.09954. (0.04231)
DETER	0.00013 (0.00029)	0.00012 (0.00029)	0.00027 (0.00026)

DEFLECT	0.00029. (0.00009)	0.00028. (0.00008)	0.00017.. (0.00010)
IMPORTS (billions)	0.00127. (0.00041)	0.00134. (0.00042)	0.00119. (0.00037)
GDPGROWTH	-0.07150. (0.02970)	-0.07375. (0.03035)	-0.07520. (0.02896)
EXCHANGE	0.02315.. (0.01193)	0.02336.. (0.01212)	0.02301.. (0.01181)
Year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Number of observations	4,312	4,312	4,312
Predicted probability	0.0168	0.01723	0.01588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95%、9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假设报复发生于在国家层面而非在产业层面上，表二中的其它两列数据将产业与国家报复变量合并为一个单一报复变量。(2)列所得到的结果与(1)列得到的结果相似，那些在上一年被美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对美国发起反倾销指控的概率平均要高1.5%。这样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化学产业，在(3)中，包括了化学产业和金属产业的交互作用项，统计不显著。有一些证据表明针对其他产业的反倾销起诉也可能是由于报复所致。

与Feinberg和Reynolds(2006)的研究结果相比，报复在一国针对美国的反倾销决策中比针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更大。但是，由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不能将本文的研究结果与Feinberg和Reynolds(2006)的研究结果直接比较。不同于Feinberg和Reynolds(2006)采用的72个出口国数据，我们采用反倾销案例的全样本数据，运用总体平均概率模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上一年遭受过反倾销起诉的国家对上一年对其发起过反倾销的国家发起反倾销的概率要高0.59，这一比率要远远低于针对美国的1.8的概率。

当然，由于美国运用反倾销比较多，所以针对美国的反倾销要比其他国家多，这一点并不奇怪。与涉及72个出口国家的全体样本的3.6%的观测值相比，在美国的二次抽样中的30.2%观测值中，报复是一种可能的动因（也就是说，报复虚拟变量的均值要比美国的高很多）。

为进一步考查针对美国出口商的反倾销报复水平，我们估计了假定美国没有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会对美国的出口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从模型当中的系数估计可以看出，一国在给定的年份对美国的特定产业提出至少一起反倾销，其概率为0.07%—46%。将这些概率加总可以预测1996—2003年间针对美国的反倾销至少会减少100例。如果美国在该期间内没有实施反倾销，这样消除了可能的报复动因，则针对美国的反倾销可能下降至76起——大于25%的降幅。

如前所述，我们假设：那些以美国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可能由于害怕引发反倾销报复，从而对美国较少发起反倾销。然而，变量(DETER)的边际效应是显著的。其他所有的估计值是显著的。当从美国的某个产业的进口增加时，针对美国该产业的反倾销增加并不奇怪。进口额每增加10亿美元，反倾销的概率增加0.13%或者是7.8%。

相似地，可以看出全球反倾销行为的增加可能会永远存在下去。一国针对美国特定产业的反倾销比上一年对其他国家同一产业的反倾销增加0.03个百分点或者1.7个百分点，这可能归因于早期的反倾销导致进口国的特定产品的大量增加，加速了该国实施新的反倾销保护。

如上所述，宏观经济因素对一国针对美国的反倾销有重要的影响。进口国3年GDP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针对美国的反倾销的可能性会增加0.07个百分点。进口国货币升值也增加了针对美国的反倾销的可能性。特别地，进口国实际汇率的一个单位标准方差升值，会导致针对美国的反倾销增加25.2个百分点。

四、结 论

我们的研究证实了早期的这么一种观点，即：（美国的或全球的）反倾销是由于宏观经济因素的驱动、或者是由于特定领域的出口流向造成的。然而，对美国的贸易政策的报复在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决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大于一般意义上所认识到的作用）。尽管经济学家应当关注反倾销政策所导致的消费者成本超出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及工人）的所得，但是本文没有进行福利计算来判断社会影响。看起来，对出口商增加的额外成本似乎打破了进一步反对反倾销措施的平衡。

译者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125105